

东庄西苑

范稳的文化写作

□周 习

早上醒来,想到了南海观音,就想到了中国的佛教,顺着就想到了鲁院班里的同学范稳,因为他的“藏地三部曲”(包括《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写的是就是藏传佛教。

范稳不但不高大帅气反而背有些弯;嗓音不但不洪亮反而有些沙哑;头发稀疏柔顺,大脑门儿,鼻梁上架一副近视镜;清瘦的身段、由内而外散发出书生的儒雅,给人的感觉反而很顺眼。由此,大家不光喜欢他的小说,也喜欢他这个人。

据说他有时不按常规出牌,如喝酒即醉,这是别人说的。但我们大伙在一起喝过几次酒,却没见他醉过,倒是有着四川人的巧嘴巴,或者做个怪样子,逗得大伙笑个不停。后来才知道,一喝就醉是他深入牧区同牧民打成一片练就的本领——和最像男人的康巴汉子喝酒的后遗症。真是醒也文学,醉也文学,为了文学,醉又如何!

他是班里的“文学大哥”,第一个跟大伙分享创作经验的就是他。那是一个下午,他要讲自己“从经验写作转到文化写作”的事。他早早地坐在前面,很认真的样子。他先是用幻灯片把自己在云南滇藏地区生活的照片一一投在屏幕上展示给我们。我们看到蓝天白云雪山下,一张骑马的照片特别帅气,还有藏区牧民的生活,都非常鲜活。

接着,他就讲创作情况,讲什么是文化创作。他说,自己写一部小说至少得3年:第一年到藏区去采风去生活,

第二年埋头读书——读西藏研究的资料,第三年才扑下身子开始创作。正因他有着这样严格的创作要求,《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才会写得这么好,每一部都冲上了《长篇小说选刊》这块高地。他说,10年来我做了一桩有意义的工作,把3本书奉献给我的读者,供奉给那片神奇的土地。从某种程度上说,不是我书写了这片大地,而是这片大地召唤了我。

范稳说,天地之间的事情比你苦思冥想的还要多。你在书房里绝对想象不出一个藏族人如何走进天主教的教堂,如何用唱山歌的嗓子吟唱赞美诗;也想象不出澜沧江边的盐民们怎么用最原始古老的方法晒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盐;你更想像不出藏传佛教、天主教、东巴教三种宗教如何在这片狭窄的峡谷里从血与火的争斗到水与大地般的交融与宁静。他说,“多年以来我一直在藏区的大地上行走,为自己的创作寻找出路。”

对于范稳的小说,一位评论家曾说,“很久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没有人如此怀有激情地表达过宗教,也少有人如此热烈地描写那些荒蛮而瑰丽的大自然风光,更难得看到生命与生命、生命与神灵的碰撞喷射出的火花。这是文化、信仰与生命强力碰撞交汇的瑰丽画卷,垂挂在当代文学荒凉的祭坛上,它是对一种生命史的祭祀,也是对一种宏大写作的哀悼。”

他极力主张一个职业写作的人要从个人经验写作转到文化写作上来。

很多同学对他的创作经历感兴趣,不断对他提问。他诚恳地说,1986年他就开始发表作品,写过都市题材、历史题材,写了10来年,也没写出什么名堂来。后来云南人民出版社搞了一次活动,叫“走进西藏”,7个作家分别从不同的线路进入西藏,他走的是滇藏线。去了以后觉得这块文化资源对他来说是无价之宝。藏文化很博大精深,尤其是藏民族作为一个全民信教的社会形态,那种信仰的虔诚,在这个信仰荒漠的时代很让人震撼。于是他发现这块富矿以后,全力以赴去挖掘,选择藏文化作为他写作的突破点。

范稳曾经把这种写作的模式称为“地质找矿”。他说,找矿的程序一般是这样的:先是普查,地质队员沿着可能成矿的地带按图上标好的路线走,发现有成矿条件的地点就标在图上;然后是详查,手段是挖槽、挖坑,解剖地表;成矿条件被进一步揭示出来后,就沿着矿脉打山洞,上钻机,就这样把一座矿山的情况摸清楚了。写作其实也是这样,对一个地方的文化与历史的认识,你先到处跑,然后感觉某个地方有戏了,你就扎下去,用各种手段去探明它所蕴藏的文化宝藏。在他看来,西藏及藏民族文化就是这样的一座文化富矿,在云南的各民族,都蕴藏着很丰富深厚的文化矿藏。关键是你如何去发掘它、学习它、表现它。他的成功得益于他的执著,满满的,旗开得胜。

他用自己的写作经历详细说明,希望我们对“文化写作”有更深入的理

解。从范稳的身上,我想到:每个作者都应该有自己的创作自留地、应坚持自己的东西,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还是尼采的那句话:在你立足之处深挖下去,就会有泉水涌出。

一天晚上,我正向葛水清请教,范稳和丁天来了,葛水平忙用茶相待。范稳侃侃而谈,丁天很安静,范稳谈他对同学创作情况的看法,很想在学校中创造学术氛围,我惊奇于他的健谈和对同学的热心。那时我想,如果要开作品研讨会,让他主持,一定很棒。

范稳很聪明,有点狡黠,要回云南一趟, 早把请假条写好,让我去机场送他, 然后让我把请假条交给孙老师。回来为答谢我, 说买了一把葫芦丝送我, 我期待着。最后却失望了, 范稳找不到葫芦丝才想起来忘在飞机行李架上。

在鲁院期间,他的《大地雅歌》要出版,他坐在我 and 毛竹的对面,很真诚地告诫我们,和出版社编辑再要好,也要先签好合同,版税要讲得清清楚楚,不要过后有纠纷,这是最起码的。

后来,我的作品《婚姻危机》要研讨,我对郭艳老师说,我写的是长篇小说,请范稳做主持很合适,她很赞成。

范稳说,周习,你拿10年前的小说来研讨,很吃亏呀。但是,也有一位文学界的朋友说过,周习,你的《婚姻危机》不过时呀,现在有婚姻危机的人不是少了而是多了。

座谈会上有了范稳的引导,大家发言很精彩。

从今天起,做一个读书写字的人

□安 琪

今天我入驻鲁院504宿舍的日子,如我所想,我在左手第一个抽屉里看到了一本笔记簿(我曾在“鲁十八”学员的文章中读到过这个情节)。

这本黄色线装,蒙肯纸质的笔记簿大约有200页厚,封面是极具《清明上河图》意味的一幅炭笔画,扉页写着4个词:继承、创新、担当、超越。这确乎是鲁院的校训,一种递进的期待。

鲁院到底是文化人的聚居地,每间宿舍里配备这么一本供人住学员留下感想的类似接头暗号的密码本,把前前后后的学员紧紧地,却又不知彼此地联系了起来。

我一页一页翻读起来,并顺手将它们打出来以作纪念。从2011年1月8日苗秀侠第一篇行文开始,这间房子

依次还住过忻尚龙、苏小蝉、栗新、王慧,他们都留下了电话号码和QQ号,但我不知道他们彼此是否有过联系。

我是从通州出发来到这里的。背着一个简单的行囊,我上了八通线,到四惠后再倒1号线到国贸,之后再倒10号线到惠新西街南口,然后再坐125路公交车。在公交车上,我看到一个满身伤口的黑色塑料袋急急狂奔出一条小胡同,然后被树枝给挡住了。今天的风真大,尽管我紧闭双唇,依旧感觉到口中咯咯作响的沙粒。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站,我下了公交车,走几步就看到熟悉的大门,巴金老人手书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字体典雅。对这馆我不陌生,此前因为一些活动曾来过,但都把自己当做过客,来去

匆匆。今天,我特意拿起相机拍了馆门、馆名,我决定更新自己与这个馆的关系,用亲近的角度走进它,因为鲁院就和文学馆在同一大院內。

说起鲁院,我早在1989年4月就和它有了联系,那时它还在八里庄,那时我还在福建。因为参加《诗刊》改稿会,我第一次来到北京,改稿会就在鲁院举办,在那里,我住了一周。

那时我20岁,于诗歌是刚起步,于人生是诸般好奇。现在我44岁,青春基本不再的年纪来到这个全新的鲁院,我所要做的是唤醒我在33岁执意北漂时那个虽茫然却勇往直前的我、那个在异乡惊喜交加的我、那个一落脚北京便遭遇漫天飞雪却兴奋不已的我。那时的我因对未知的期待和对眼

前诸事的陌生而产生一种新鲜感。是的,陌生和敏感,这是我现在想要的,我麻木的心已提早结出了老茧,这使我的写作僵硬而迟钝。

和“鲁十九”其他学员不同,我来到北京已经10年,其间经历的困顿、焦虑、折磨、揪心和如今的终于安稳,早就是一部长篇小说了(遗憾的是我不会写小说)。我想我不会像来自祖国各地的学员一样,对北京的风景有着怎样不倦的寻踪,我只期待用这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静心读书、听课,并且在与同学的交流互动中激发出自己已经沉酣的创作潜力。事实上,在来鲁院之前的这一年里,我的诗歌创作基本已处于休眠状态了。

从今天起,做一个读书写字的人。

王新军

□郭明辉

比如说,1894年,作为一个特定的时间,对略有中国近现代史知识的人来说都不陌生,都会联想到中日甲午战争和之后的中日《马关条约》。当然,我可以把它命名为《甲午的厨子》,这样一来似乎就不会显得另类了。现在,我常常会想起小时候经历的两个村庄之间为争一块地边而发生的械斗。那个夜晚,村里挤满了人,人人的脸上都是紧张、骚动和茫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一种感觉生活的方式在支配着我的思维。人生中有不少这类不在所谓价值体系内的东西。《1894年的厨子》是不是触及了此类东西也难得。事实上,我在创作这部中篇小说的时候,多次想到,小时候我们村和邻村争地边的那个紧张的夜晚,以及那件事的前前后后。

关于主题

“主题”这个话题太大了。这里只想说说自己这本集子里几篇小说的主题问题。写文章就是想想法。我觉得小说不是要说道理,而是说道理存在的

可能性。比如《腊月初八打劫》,我想表达的东西应该都在文字里潜伏了。比如为什么打劫,为什么腊月初八打劫,为什么还理直气壮地去打劫等等。有评论说,这部小说写出了“三农”问题,也有人说写了“不公”的社会隐患,还有人说写了打劫者的暴力本性问题。这些看法都比较接近,像一个圆的无数条半径, 连接着问题的核心和边缘。毕竟每种看法都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问题都是关于人的问题,是值得社会关注的问题。也正因如此,小说才变得复杂起来。

再比如《寻找一棵树》,作品写了一个女孩子“出租生殖”的故事。生活中像霍兰媚这样“出租生殖”的故事早已屡见不鲜,但是,在这部作品中,霍兰媚没有像其他“出租生殖”的女性那种“职业化”,在妊娠的过程中她原始的母性被唤醒,以致违约。在这个消费时代,这一点明显带有理想化的色彩,这样可能会削弱作品的现实震撼力。但我依然选择了理想化的表达。

桃李天下

杨晓敏

是鲁迅文学院的第二屆高研班(主編班)學員,他的評論集《當代小小說百家論》近日由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

這是一部專門針對小小說進行評述的理論專著,是作者多年潛心研究之所得。在大量閱讀作品的基礎上,作者知人論文,對現當代100位小小說名家及其作品進行了精彩、獨特的評述,讀者從中可以体会到楊曉敏對小小說研究的情有獨鍾以及為此付出的大量心血。

楊曉敏現為河南作協副主席、《小小說選刊》《百花園》主編。他多年來在小小說這一領域不斷耕耘,挖掘出一批批優秀的小小說作家,持之以恆地為該文體的發展探索各種可能性。

武歆

是魯迅文學院第三屆高研班學員,他的長篇小說《重慶愛情》近日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重慶愛情》與他之前寫的《延安愛情》《北平愛情》《天津愛情》構成了“紅色愛情系列”長篇小說。

這部小說以外省青年洪建川和本埠女子佟愛蓮在重慶的生活和愛情為主綫,描寫他們在經歷了一系列生活磨難、精神蛻變之後,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逐漸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最後,洪建川在護送民主人士前往北平的船上受傷犧牲,佟愛蓮接替心愛的人完成了任務。小說還書寫了其他幾對不同年齡、不同身份的戀人的愛情故事。

在重慶獨特的人文景觀和自然景觀的背景之下,小說充分展現了中國戰時陪都的青年人的人生追求和愛情悲壯之歌。故事情節曲折跌宕,情感描寫真摯感人,具有引人入勝的藝術感染力。

王新军

是魯迅文學院第十五屆高研班學員,他的中篇小說集《好人王大業》近日由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新疆電子音像出版社聯合出版。

收入本書的小說主要以西部乡镇生活為題材。這些小說以強烈的現實氣息、樸實的语言質地和溫情的寫作風格,在當今西部文壇獨樹一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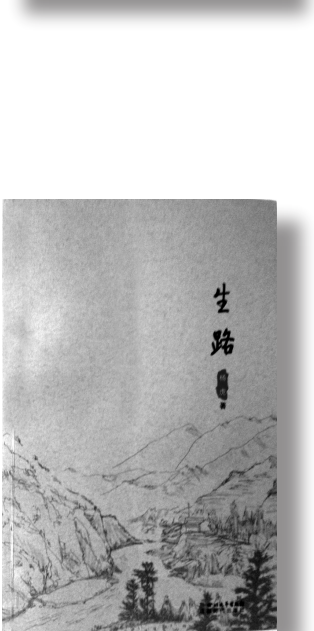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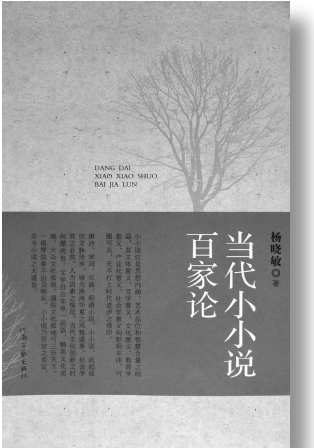
其中,《鄉長故事》《俗世》《好人王大業》《落葉飛翔》等在刊物上發表時,曾被《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中篇小說選刊》《作品與爭鳴》《領導科學》等刊物轉載評介,得到讀者的積極回應。

杨虎

是魯迅文學院第十九屆高研班學員,他的長篇小說《生路》近期由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

這是一部反映新農村建設的長篇小說。該書以川西龍門山為背景,講述了一個名叫虎形崖的小山村裡,村長王大山帶領胡幺、二狗、立秋等幾代山民為改變山村貧困落后面貌,興修出山的公路而獻出了生命的悲壯故事。“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所有村莊都是疼痛的”,作者對此懷有深深的悲憫之心。他牢牢把握住人物悲歡離合的命運,淋漓盡致地描繪出了山村人民為改變命運付出的艱辛努力。

該小說人物生動,情節曲折,充滿生活氣息的細節描繪引人入勝,濃郁的川西風情和蕩漾在字里行間的幽婉民歌更平添了小說的藝術氣息。



我思我写

重置后可以去发现

2008年,在魯迅文學院學習結束以後,有近一年的時間沒有寫作,不是不想寫,而是不想重複自己。重置就是退步,這是我在魯院最深的體會。2009年下半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出版了第二本中篇小說集《尋找一棵樹》。

正所謂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拿到樣書後,一下子便發現了問題。應該說,之所以能够發現這些問題,是因為這7篇不同時期創作的小說被集中放置在一起。“重置”意味著問題的暴露。就像一個單位的班子重組一樣,過去的缺陷和優點就一覽無余了。

叙事问题

小說的敘事問題,並不太容易說清楚。我現有的作品,如果存在所謂的“敘事”,也只是以習慣使然。在這方面,我可能更偏好中國傳統的敘事樣式。有段時間,我很喜歡傳統的戲曲、曲藝及話本等。今天我們經常提到的那些“敘事”、“形式”等,大都可以在這傳統的藝術中尋找到“原型”。因此,傳統藝術作品中的“敘事奧秘”仍然需要我

們悉心領會,好好運用。事實上,我在寫小說時,不僅追求把故事講流暢,而且還要講得有趣味。因此,我注重在作品中描述人物的“細密動作”,力求讓讀者在閱讀時得到直接的愉悅。

說到敘事,就不免要談到技巧。我一向尊重技巧,但是不依賴它,技巧容易使得一個寫作者變得自高自大。有些篇章的處理,甚至不惜丟棄技巧。這些,可以從《1976年的隱私》《九月九日的垃圾》以及《郎里格郎》中發現。

标题中的时间

小說總是擺脫不掉“時間”。在這本集子里,除了最後一篇《尋找一棵樹》和《郎里格郎》之外,在標題上都有明確的“具體時間”。如《1976年的隱私》中的“1976”、《1894年的廚子》中的“1894”、《臘月初八打劫》中的“臘月初八”、《九月九日的垃圾》中的“九月九日”、《宋朝小姐》中的“宋朝”。時間,是這部集子中的關鍵詞。回頭想一想,這是巧合,也是必然,畢竟,小說尋找的是它最恰當的時間。

盡量不在書頁上涂畫的習慣,與之相矛盾的是,盡管剛讀不及三分之一,還是忍不住一再翻看封面沒有受到污損。我很少這樣,對一本書一邊痛惜一邊下“狠手”。

這本書的副標題是“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哈羅德·布魯姆在序言里申明,“我在此不是要做關於閱讀的說教,因為那樣我就是在對可教者勸喻,而且我有時惟恐會變成有關如何及為何閱讀的傳道士。”書里按“貴族時代”、“民主時代”、“混亂時代”劃分,挑出26位經典作家詳細談論,並在書后羅列出經典書目,我數了一下,一共1513部。

在文後“哀傷的結語”中,他說:“本書並不專為學術界而著,因為只有

一小部分學者仍然因喜愛閱讀而讀書。被約翰遜和他之後的伍爾夫稱為‘普通讀者’的人仍然存在著,而他們可能仍然歡迎各種有關讀書的建議。”“這類讀者既不為輕鬆愉快而讀書,也不是為了消除社會的罪孽而讀書。而是為了擴展其孤獨的生存而讀書。”作為一個“普通讀者”,讀到這樣的書會感覺如獲至寶,因為它幫助我們尋找一個角落,讓我們暫時安穩下來。

作家張楚曾說,讀書猶如老派男人談戀愛,驚訝於他的敏銳,又不得不佩服他對書籍的多情。一般說來,寫作可以說是個人的心靈跋涉、探險、追逐。無論是空曠的白天還是寂寥的黑夜,是將道路走穿還是半途而退,外力無法相助,只能依靠獨力完成。而談

□常聰慧

书海一瓢

经典的文本以及文本的经典

2013年开局,我读的书是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这本书2011年7月出版,但我一直没注意。去年买到同一作者写的《如何读,为什么读》,不过读了之后并没什么大的触动,可能是被《巴黎评论》和《为什么读经典》吸引了太多注意力的原因。

在读书上,我始终有一个疑问:书到底应该如何读?问过许多人这个问题,但一直没找到让我心悦诚服。针对“我”的答案,就这么一直读,一直糊涂着。几位师长索性直点症因,说我太急躁。急躁是因,但读书究竟应该怎么读呢?我还是很不服气。

冥冥中也许是为了将我的思路“正”一下,《西方正典》拿到手,一读之后便欲罢不能,并且破坏了一直以来

尽量不在书页上涂画的习惯,与之相矛盾的是,尽管刚读不及三分之一,还是忍不住一再翻看封面没有受到污损。我很少这样,对一本书一边痛惜一边下“狠手”。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哈罗德·布鲁姆在序言里申明,“我在这里不是要做关于阅读的

书,是一个陌生人与另外一个陌生人的接触和交谈,是发现,是惊喜,是相惜,是尊敬,是彬彬有礼的握手,是坦然放下成见随心所欲将自己心灵向对方的敞开,是全身心式的倾听、辨认、争论、和解,以及对对方的崇拜。看,这些读书历程确实像张楚所言,是谈恋爱的感觉了,对我来讲,却是一种找对老师的感觉。

曾经有一位前辈问我:“你所说的‘老师’到底是什么范围?”我不加思忖地回答:“天下为师。”也就是说,没有范围。对于我来说,只要能够产生共鸣的,就是好书。写字的人,能够穿越时间和地域界限,征服另外一个陌生人,那是多么浪漫的事。对这样的作家作品,我总想和更多的人分享。

